

第三只看民族与民族主义

陈彦

吉尔·德拉诺瓦教授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理论基础与历史经验》一书的中文版，几经周折，终于得以面世。德拉诺瓦教授是笔者多年的朋友，又是我们这套“法国思想家新论”丛书的主编之一，笔者自然很乐意利用为序的机会向大家推荐此书。不过，此书之所以值得推荐，当然是由于其重要的思想与学术价值。

作为欧陆思想重镇的法国，理性主义传统根深蒂固。笛卡尔以降，思想界重视建构理性系统，卢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萨特一直到当代的德立达均以理性建构而光芒闪烁。相对来说，像蒙田、伏尔泰甚至托克维尔、阿隆则稍逊风骚，或被遮掩或被冷落。一直到了今天，蒙田已渐为思想界重视，托克维尔研究更是成为显学，阿隆也留下了众多的嫡系传人，但这种重建构，轻“经验”的传统仍然难以退出学界舞台，尤其是学院派把持的学术阵地。

最近的例子是以塞亚·柏林在法国的遭遇。当代最敏锐的思想家之一柏林的“自由四论”（1969年英文版）虽然早于1988年就以“自由颂”为题出了法文本，但基本上没有引起重视，法国学界开始对柏林有所重视还是2003年柏林的另一本重要著作“事实的常识”（*Les sens des réalités*）法文本问世以后的事。而德拉诺瓦正是这后一本书的译介者。笔者在这里提的问题是为什么是德拉诺瓦而不是其他法国学者来译介柏林的书？他们之间难道有什么联系吗？回答是肯定的。从蒙田以来，法国的确存在着另一条思想传统：经验论、怀疑论的传统，但却难以发扬光大。法国思想界将发展怀疑论的任务让给了英伦三岛的同事，柏林正是英伦思想链条上的最后一位伟大传人。怀疑论不事建构，怀疑一切建构系统，甚至怀疑建构所拥有的基本材料—知识。然而，怀疑论却是最基本的建构，没有怀疑论的挑战，就没有旧体系的瓦解，就没有新体系的确立。面对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对自身社会的改造，对意志的崇拜，对体系的盲信，对新奇的追求等等，怀疑论时时在警告人类不可过于自信，过于盲从，对貌似真理的教条，对待未知与未来世界，必须多保持一份警惕，一份敬畏，一份谦卑，一份谨慎。柏林是公认的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大师，但对海耶克以自由主义乌托邦抗衡国家主义的主张，柏林却表示他不相信任何系统。何谓自由主义者？柏林说：《自由主义者不仅要能够接

受不同观点，还要承认对手很可能有道理。」怀疑论者相信什么价值吗？柏林回答说：“怀疑论正是一项值得保持的永恒价值。”

是的，德拉诺瓦也是一位怀疑论的相信者，这是他心仪柏林并向法国学界译介柏林的原由。德拉诺瓦1993年出版的“谨慎颂”一书是他的成名作，而谨慎正源于怀疑。《民族与民族主义--理论基础与历史经验》一书是德拉诺瓦对民族现象怀疑、解析、辨误的集大成之作。此书以不大的篇幅，对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作了系统检索，从民族的词源、历史成因、民族意识、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民族国家模式及其前途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详尽分析。我们知道，民族问题与民族主义研究目前在中国与西方都不仅是显学，也是异常敏感的政治问题；民族主义不仅在学界、思想界争议频起，也会使社会、政治生活动荡不宁。面对西方汗牛充栋的有关民族主义的论著，一位以研究谨慎著称的学者为何要踏入如此是非之地呢？

可以将德拉诺瓦此书研究的问题概括为两部分：一是分析解剖前人及当代学者在民族及民族主义问题上所留下的理论与著述；二是将民族现象纳入到一个开阔的全球范围内的历史与地缘的时空背景下求源、比较、梳理、解构、定位。作者认为，同民族主义一样，民族也是一种近代现象。在既无明确的疆域概念，又无严格的主权概念的混浊的古代，我们今天所讲意义上的民族是不存在的。从人类社会的组成方式上来看，民族国家乃是出现于城邦、帝国之后的政治形式。但是，民族国家并不是古代带有共同部落、血缘、语言等特征的族群的现代延续。民族、民族国家或多或少都是现代建构与历史演变结合的产物。作者认为，只有从历史长程视点着眼，将民族、民族兴衰、民族国家、民族思想及民族主义等看作是民族现象的不同表象，才能较好地把握历史的真实。从这一高度出发看民族现象，可以说，迄今为止，无论是多不胜数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典籍，还是世界范围内存在的数以百计的色彩斑斓的民族国家以及尚无国家的民族，都能够以普世与特殊这一对相反相成的哲学范式来进行概括和分析。从此入手，德拉诺瓦从人造的与有机的，个体的与集体的，独立的与依赖的，政治的与非政治的，超验的与功能的，人种的与公民的，连续的与断裂的等各个层面来梳理民族现象，分析民族理论所得以支撑的根据。对于作者说来，近代以来的民族现象虽然时时被形形色色的强大意识形态潮流所遮掩，但其持续时间之长，蔓延之广泛，形态之多样，生命之强韧则是任何意识形态所无法企及的。而个中原因正是由于民族现象中既

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的两极：普世与特殊，政治与文化，个体与集体……，此二者不仅如车之两毂，鸟之两翼，缺一不可；而其内在张力也正是民族现象的巨大能量之源泉。作者指出：“民族，或民族国家，时而隐忍不发，时而浩浩荡荡，席卷了整个世界。尽管各种替代性的意识形态，形形色色的国际主义，潮起潮落，可能减弱民族现象的影响力，但却从未使民族本身式微。恰恰相反，民族现象短暂的退隐常常会激起更强的民族反弹，导致民族的重建和复兴，更为经常的甚至是新兴民族的出现。”实际上，“从其广度、韧性、变化来说，民族现象主宰了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历史。”

德拉诺瓦的语言与思辨风格以简洁、精到著称，读“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有点类似于某种智力游戏，作者总是能够在一般人习以为常的地方提出问题，启发思考，推倒流行的结论。将怀疑论与谨慎论带入到民族现象的研究之中，正如使他的观察和分析增添了具有灵性的第三只眼睛。我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我觉得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此书可以给我们重要启示。

第一是怀疑。民族与民族主义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政治哲学主题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学界、政界研究讨论最多、争议最烈的基本思想政治问题之一。围绕着民族与民族主义，各个学科，多种学派都留下了丰富和繁杂的理论、观点。然而，作者认为，这些多而杂的论述，并不能令人满意。无论是对于民族还是对于民族主义，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各有自己的界定，各有一定之理，又各有自己的盲点。如民族这一看似明白无误的概念，一旦认真追问，就可发现疑问。诚如作者指出，“民族作为一个事实存在是不证自明的，但此一事实包罗繁多、往往神秘难辨。表象看来一目了然，然而一旦证之于事实，问题就来了。”正如时间、生命、死亡等概念，我们知道其存在，但并不确切地知道是什么。从世界范围看，语言、人种、领土、宗教、文化等因素都不能界定民族的边界。以中国的情况为例：讲汉语的是否都属于汉族？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外的华人难道不属于炎黄子孙吗？同样，宗教、文化的同一性也不是界定中华民族的标准。实际上，古今中外，这些看来十分堂皇的因素从来不足以确定一个民族或一个民族国家的特性与疆域。不过，如果说民族不能以上述各类“文化”性质的因素来加以准确界定的话，民族也不能仅仅从开放的政治意义上来加以界定。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价值上的趋同并不是建构民族国家的充分条件，而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不同的民族的普遍认同才产生了普世价值。民族是文化与政治因素互相作用的产物，处于一种不断演变过程之中。在世界现存的大部分民族国家的形成

过程中，文化、历史的巨大制约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奠基于文化传统之上的不断推陈、不断开新又是民族延续的条件。

德拉诺瓦提醒我们，不仅必须对民族、民族主义这类基本概念保持冷静，对前人所作出的各种定论也应该大胆怀疑，究其不足。以倡导《第三条道路》著称的英国社会学大师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断言：民族若没有形成，则绝不可能会有民族主义，至少绝不会有现代形式的民族主义。但同是英国学者哲学家盖内尔（Ernest Gellner）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则表示：是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而不是民族孕育了民族主义。实际上，在现实世界上，这两种说法都是成立的，民族主义可以创造民族，正如近代以来潮涌般出现的民族国家；民族当然更可以孕育民族主义，由古老文化民族发展而来的近代民族国家内的民族主义并不弱于新兴民族国家中的民族主义。根据一定的条件，民族与民族主义可以互为因果，简单的界定往往会流于片面。德拉诺瓦就此表示，以民族主义来定义民族（盖内尔）会低估民族的作用，而相反，以民族定义民族主义（吉登斯）则会低估民族主义的作用和危害。民族与民族主义实际上处于一种相互制约、相互激励，既互为条件又对未来开放的变迁与互动之中。这种变动不居的关系要求观察者不断地提问，不断地追寻。

第二是尊重。在悉心辨析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同时，对民族、民族情感应该给予必要的尊重。如果将民族现象分成民族、民族国家、民族情感、民族主义各个不同的层次，那么各层次之间是互为联系、层层推进的关系。对民族、国家、文化的爱戴，属于个体对其所属群体的自然情感，是集体认同、文化归属的内在需求，并因此生发出对外要求承认和要求尊重的愿望。对此，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都不难体验：对祖国江河山川的眷念，面对本国球队胜利时的欢欣若狂，听到熟悉的国歌时的荡气回肠，等等。对于这种依恋与需要，我们既应该承认其存在的正当性，又必须认识到此类情感既可能激发近乎神圣的集体认同，成为推动建构民族国家的积极动力；也可能走火入魔，将民族推入仇恨与征战的漩涡。不同的引导，内外的压力，失败的悲情，胜利的骄傲都可能使民族情感或内聚为良性的爱国主义，或外现为极端的民族主义。过分压抑民族情感会导致反弹；过分宣泄民族认同则会诱发仇恨。要引导民族精神走向宽容、包涵、和平和具有建设性，应该给予民族情感必要的理解和尊重，正视其位置，承认其重要性。德拉诺瓦指出：“理解民族的概念不能简化为理论上的理解。民族的存在就像是美学和象征性的物品一样，以叙述和情感的形式表现出来。”

德拉诺瓦是从西方看世界的，对于他国民族情感的尊重，是当代西方反思的题中应有之意。以西方反思殖民主义历史为例。发源于西方的殖民主义浪潮，既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又留下了不可否认的族群仇杀罪孽。今天的西方学界，在大力反思自己文化的殖民罪责的时候，将民族主义的张扬同殖民主义的历史联系起来思考。这一方面论证了殖民地国家兴起的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有其历史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也应该使我们后来人看到一些在历史上危害甚烈的极端民族主义往往是从利用本民族的受到伤害的悲情发端的。对于我们东方的殖民时代的受害国来说，尊重民族情感，当然不能意味着重翻近代史上西方对东方的殖民旧账，以当今的民族主义报复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如果将历史反思停留于殖民与仇杀，人类可能沉溺于以暴易暴、冤冤相报的宿命，重蹈上世纪极端主义的覆辙。尊重民族情感是要尊重历史，尊重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正视历史、正视文化，吸取教训，进而超越历史。

同时，从民族国家内部说来，尊重民族情感，当然不意味着压抑个体的选择。按照法兰西政治民族原则，个体选择改变文化认同（如公民改变宗教信仰）的权利必须获得法律的保护，而且，只有在血缘上、文化上属于某一族群的个体，事实上拥有选择或不选择其是否属于本民族的权利之时，政治民族原则才可以成立。这里涉及的是在共和体制之内个体与社群的关系，民主共和的法制框架，既必须保证个体选择的权利，又必须保障少数族裔的权利。作为政治民族原则的拥护者，德拉诺瓦强调的是不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个体权利已经获得确立，个人自由获得保障的民主环境下，尊重民族情感，理解社群认同，保障少数族群的权利，毋宁说是现代宪政制度保障人权的必要的延伸，而非相反。

第三是谨慎。德拉诺瓦告诫我们，对民族主义必须具体分析，不能把民族主义当作一般意识形态教条对待。一定的意识形态往往同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历史文化背景相联系，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则往往超越时空，在各个历史阶段和各个民族、各个文化区域都能大行其道。民族主义可以或隐或显、刚柔互换，时而暗流无声，时而呼啸汹涌，可以逆时而起也可以与世共谋。同是奠基于民族情感的民族主义，可能将民族利益作为最高依归，并最终葬送民族利益；也可能初始即是违背民族利益的，所谓民族主义只不过是几个别集团利益欺世盗名而已。不同民族可以孕育类似的民族主义，同一国家在不同时代产生的民族主义也可能性质迥异。即使同一时期、同一国家的民族主义也可能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价值指向（如二战时期法国戴高乐和贝当所分别

代表的抗战和投降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多重性格、多重形貌的特点是其优势也是其弱点。即使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表现出同其他强大意识形态更为强大和坚韧的生命力，但民族主义潮起潮落，或随波逐流，或狂傲不羁，往往仍必须依附和屈从于其他意识形态才能成活和发展。对民族主义谨慎以待，一方面必须对民族主义追本穷源，洞察其是否有表里如一的价值指向，发掘其建构、开放的因素，防范其专横、封闭的机制。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民族主义可能从左右两极都走向极端的危险。将民族主义看作是拯救民族的灵丹妙药，放弃人类共通的价值追求，会将民族引向癫狂的深渊；而将民族主义看作是洪水猛兽，无情鞭笞，很可能既会伤害民族主义借以依凭的民族情感，又会使民族主义获得发展动力而适得其反。

上文提到，从世界范围看民族现象，可以将形形色色的民族、民族主义置于普世与特殊的两极范式下去分析。从近代民族源起历程看，民族现象的上述两极集中体现于法兰西、德意志两种民族理念的交锋与博弈。以法国启蒙思想为代表的政治民族的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以德国浪漫主义为核心的文化民族的哲学基础是“整体主义”

(holisme)。一般说来，普世的个人主义以认同开放、建构未来为其特点，但普世开放也可能导致扩张，将“普世”理念强加于人，并最终走向极权主义；特殊的整体主义趋于封闭、排他，可以借用血缘、种族、文化之名，否定个体独立意志，拒斥自由选择，直至迈向法西斯主义。拿破仑可以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名义进行扩张，建立帝国；希特勒则将文化、特殊、血缘发展到极至，制造种族屠杀。近世以来世界历史的惨烈教训，要求我们警惕民族主义的两极走向。然而，从思想脉络上看，这两极分化并非总是泾渭分明。被柏林称作文化民族主义之父的德国十八世纪天才思想家海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别具慧眼，他不仅点破了启蒙思想中所隐含的普世帝国主义危险，也看到了盗用普世之名施行强权专制之实的可能，尽管他并没有看到拿破仑称帝。十八世纪的海德站出来捍卫的不仅仅是文化的特殊，也是文化的多元。不过，海德的理论虽然合理的解释了法国普世性民族主义在拿破仑扩张面前的崩溃，但却无力回答为什么属于德语文化的阿尔萨斯人会自愿选择归依法兰西文化？德拉诺瓦在本书中对海德思想有精辟的论述，通过对其思想个案的剖析，他提出了发人深省的普世与特殊互相转换的问题。强加的“普世”会蜕化为特殊，而特殊对强加的“普世”的抵抗可能恰恰是捍卫了多元。不过，海德没有想到，他的“文化民族有机论”为后来德国民族主义的恶性病变提供了养料。强加“普世”固然潜藏着导向帝国主义的

危险，以特殊排斥“普世”也可能会步入种族主义的深渊。

如果说海德思想是以特殊捍卫多元然后演变为排斥多元的精神武器的例子的话，康德的绝对道德律令的转化则为我们提供了相反的个案。柏林曾对康德思想与德国浪漫民族主义的关系进行过鞭辟入里的探讨。康德的思想体系无疑属于启蒙主义、世界主义，他的脍炙人口的“心中道德律令”正是奠基于个体自由、独立选择。然而，经其学生费希特之手，心中的道德律令却变成了民族集体的神圣的呼唤，个体自由于是被献身集体所取代。

第四是开放。无论民族是如何多种多样，民族主义是多么形形色色，民族现象归根结底仍然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从普世与特殊这两个基本范畴出发观察民族现象，民族其实正是此二者的有机结合。民族是文化的，是历史形成的，因而是特殊的；民族是建构的和不断演进的，因而是普世的。在民族这个历史舞台上，上演着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的大戏和小戏。这个舞台不是中性的，它提供空间、提供素材、提供渠道，从文化轨迹、传统积淀层面规定、限制着戏剧的内容、规模和结局。但是，民族舞台上上演的剧目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民族的历史剧是延续与创新的结合，没有延续，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没有创新，民族就面临死亡。古今中外，能够经受时间考验的民族必定是开放的民族。开放是民族得以存在和延续的条件，开放是延续与创新之间的桥梁，开放使得民族的特殊性与普世性两重必不可少的性格得以共存。从世界范围看，民族可以源自相对长久的文化传统，也可以是近代兴起的新兴民族。新兴民族以文化开放、政治认同确立于世，古老的文化民族也必须面向未来，选择开放争取老而弥新，否则只能由于封闭保守而走向衰败。

从民族现象的角度讲开放，不仅意味着一个民族相对于自己文化传统的开放更新，面对外部变迁的适应和演化，也意味着民族现象本身的兴衰与蜕变，正如文明可能兴衰枯荣，民族、民族国家也可能由近代的兴起渐渐走向式微。换句话说，民族、民族国家既有其起源的历史，就有可能随着其发展、推广而走向消解。近代民族国家曾以民族独立为号召，在世界范围内普及了民族国家的政体形式，但是，今天步入全球化的世界正日益增多地对民族国家的政体形式提出质疑。从欧洲来说，欧洲联合工程正是对民族国家政体模式最典型、最深刻的质疑。欧洲曾经相信，近代以来从欧洲发源的民族觉醒的潮流，可以将人民、族群带出专制、强暴、帝国、霸权的魔掌。然而，民族国家兴起至今的历史表明，暴力和战争不仅仍然同人类如影随形，而且变本加厉，

愈演愈烈。民族主义与极权主义相互激荡，酿成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苦果。回望历史，人类寻求和平，为什么获得的却是战争？难道和平与战争本身互为因果，相辅相成？民族国家是否本身就是战争之源？有没有可能从战争与和平的漩涡中超越出来，构筑更高层次的民族国家关系模式，从而永久告别战争？欧洲联合努力所寻求的正是超越民族国家模式之路。德拉诺瓦在本书中劈专章讨论民族之后是否还存在政治生活是很有见地的。欧洲是否最终能够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显然还有待于历史的回答，但是，在建设欧洲的过程中，欧洲民族表现出来的无疑是开放的意志和前瞻的眼光。

× × × × × ×

从中国文化体系理解民族与民族主义，德拉诺瓦的观察是发人深省的。同欧洲相比，中国追求近代化的历程虽然艰难曲折，但中国文明在回应西方挑战时所表现出的文化反省和开放精神也是世界有目共睹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是民族主义回潮的时代。作为战略对策的民族主义，提倡国粹的道德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替补型的民族主义，从西方引进的反西方主义，甚至虚妄的“中国可以说不”的民族主义纷纷出笼。鉴于当今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全面转型的特殊氛围，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表现出较多的封闭、排他、狭隘和浅薄的特点，这同中国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的主潮形成对照。从洋务运动开始的西潮东渐的历程看，中国民族主义显现出的更多的是开放和虚怀的主调。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发端，中华民族的先进份子就坚决步向了“师夷之长技”的开放逻辑。新的研究表明，甲午战争之后全面兴起的中国民族主义就是同世界全面接轨的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¹。梁启超、孙中山倡导的民族主义以建立中华独立民族国家为宗旨，不仅属于开放的、将来指向的民族主义，更是以自由、民主为基本内容的政治民族型的建构的民族主义。通观整个近代史，尽管中国现代化之路艰难曲折，也不乏狭隘的、专横的民族主义潮流，但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先进份子对西方文化仍然表现出少有的开放心态。从文化特质看，中国文化体系是否同法兰西开放的政治民族文化体系有更多的亲和性？相对于德国文化民族寻求保护自己文化特殊性的努力，中国文化潜意识似乎更多地受到某种文化优越性而非文化独特性信念的支配，更多地幻想有朝一日进入国际社会，遵循同等国际规则同西方强国一较短长。与此相比，今天以“说不”、“阴影”及“妖魔化”等作为话语基础的民族主义显然缺乏民

¹ 参见徐国琦“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二十一世纪”2005年八月号

族的自信和文化的底气。中国文化曾经孕育了“文化天下主义”，这是一种既包含文化自我中心取向，又放射出灿烂的开放光芒的普世主义。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如何同近代开放的、建构的民族主义接轨？中华民族有否能力将“万邦来朝”的自我中心的盛世情怀转换为一种“万国归心”的价值认同的天下主义？这是二十一世纪向我们提出的严峻挑战，是如何在全球化大框架下完成中华文化转型的大课题。同今天欧洲正在寻求超越民族国家的努力相比，我们即使从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传统中，可以发掘出开放与普世主义的价值取向，但无可置疑的是，中国迄今为止的现代化努力仍然属于赶超型并局限于民族国家框架之内。欧洲联合工程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不甘宿命，赶超先进的自信，也是勇于创新、否定自我、超越自我的勇气。

陈彦, 200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d/2.0/fr/deed.fr>